

# 货币与强制

##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JONATHAN KIRSHNER

[美] 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 巍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货币与强制

##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JONATHAN KIRSHNER

[美] 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 巍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美)科什纳(Kirshner, J.)著;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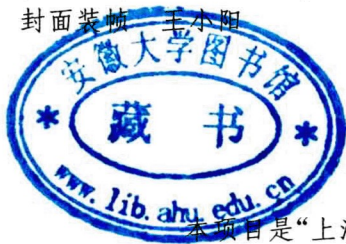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11650-4

I. ①货… II. ①科… ②李… III. ①国际货币-研究 IV. ①F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942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张笑天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本馆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 货币与强制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美]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 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305,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650-4/D·2343

定价 45.00元

# 中文版序

## 货币、强制与当代中国

自从二十年前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货币权力的运用继续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特征。在这二十年里，世界经济形势也发生了两大基本变化：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不稳定甚至危机），以及中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崛起。这两大变化重塑了货币权力运用的时机和选择。在 21 世纪的今天，了解和掌握货币与强制的三大工具——货币操控、货币依赖以及体系破坏，无论是对于研习国际政治的莘莘学子还是从事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实践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些货币权力工具也深受时代变迁的影响。

正如《货币与强制》在文末中所提到的那样，全球金融市场改变了货币权力发生的环境。市场的规模在不断扩张，同时世界上小国和弱国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我所说的“市场追强效应”（market bandwagoning）在决定货币操控的前景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同样也影响了权力实施国对货币依赖的利用。从货币体系的提供方来看，强国更加希望自己处于货币安排的中心位置。除了传统的追求政治影响的动因外，在面对破坏性力量时，潜在的货币领导国现在也更有动力来加强自己的隔离性和自主性。从货币体系的需求方来看，小国则倾向于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寻求庇护，因此参与国际货币安排对它们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sian Monetary Fund）的尝试胎死腹中，但这一努力仍旧显现出，创建这种国际货币安排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一过程也体现出了货币权力的不断运用——建立亚

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受到几个国家的暗中破坏,美国则是“带头大哥”,因为它担心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会蚕食美元的影响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与日益增加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紧密相连(这一点并不奇怪),因此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实施体系破坏的可能性。每一种金融秩序,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存在着脆弱性。

比全球金融扩张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中国的崛起,这一势头早在1995年就已日益清晰可见。《货币与强制》第一版发行之初,没有人想到中国会成为一个货币大国,并且在短期之内也没有成为货币大国的可能。比如,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量尽管比较充裕且不断增长,但和今天的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在《货币与强制》中,中国仅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开货币战争的战场被提及,当时中国是日本劫掠型入侵的受害者以及英美保护型援助的接受国。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迅速崛起为一个真正的货币大国,了解中国将如何运用货币外交的工具不仅趣味丛生而且意义非凡。

就货币操控而言,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在帮助那些处境危困的国家之时,中国处于实施保护型货币操控的有利地位。事实上,如果这一景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没有发生的话,倒是令人备感诧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小国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之下,实施负面的劫掠型货币操控可谓大有机会。尽管如此,国际体系中的精英国国家很有可能会拒绝利用这些权力工具。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也有充分的动力避免拙劣的权力炫耀。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大国如果希望培育他国形成对本国的货币依赖,就必须自我限制强制性权力的实施。而在可预见的未来,鼓励货币依赖很可能会成为北京货币外交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瞠目结舌。除非这一轨迹被中途打断,否则根据《货币与强制》的基本逻辑,中国一定会着眼于推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并且最终会将人民币打造成为东亚地区的国际货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民币会向着这一角色逐渐迈进,其发展速度取决于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因素,而人民币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却是毋庸置疑的。引领人民币发展的有两大动因:中国对提升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以及对增强政治影响力的希冀。当代历史上其他大国扩张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

力,也一贯是出于上述两大原因。就当代中国的案例来看,这两大动因尤其突出。虽然各国在国际市场推广本国货币的主要动因在于加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但在当代中国,争取更大程度的经济自主性,则成为其在2007—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这场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合法性,尤其是考虑到在仅仅十年之前刚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危机过后,中国更愿意与美元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试图给放任无度的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一个替代性的经济治理模式。自然,中国的这一想法也和加强自身政治影响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有着众多地缘邻国的崛起大国来说,拙劣的权力表演和肆无忌惮的耀武扬威可能会招致后院起火,结果将事与愿违,而鼓励人民币的区域使用,却为中国拓展其政治影响力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咄咄逼人甚至是让人乐见其成的方式。

正如本书所提到的,那些追求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秩序领导地位的国家,都是受政治考量的激励。领导国尤其是希望借助这种货币秩序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更强的经济自主性,也即通过它来抵御外部冲击或设置缓冲器以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尽管某一货币区的领导地位可以给该国带来新的强制力杠杆——这种权力过去也被许多国家使用过,但货币依赖与经济剥削并无关系,而是关涉货币的稳定性;相对于提高硬实力来说,鼓励他国对本国形成货币依赖,其目的更像是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经济,而中国也将会适度调整其战略,将这些国家出于利益需要而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转变成为中国的政治优势。

鼓励人民币的国际化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着手点,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中国追寻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自主性相映成趣的案例发生在20世纪末期的日本。当时,随着日本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日本政府官员幻想着日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而这将进一步促进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然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使得这一幻想成为泡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试图重拾这一幻想,但却遮遮掩掩,极尽各种伪装形式。危机之后,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亚洲各国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十分向往。它们期望从美国控制下的全球金融秩

序中争取更多的隔离性、自主性和自由度。这些努力反映出了亚洲各国对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不信任,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对美国对外转移宏观经济调整负担的能力,及其在汇率问题上的长期施压的幡然顿悟。

这些问题,尤其是美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全球金融管理上的思想分歧,都可以在当代中国找到似曾相识的案例。自21世纪之初,尽管对暴露给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美国对外转移经济调整负担仍旧保持警惕,中国还是谨慎地踏上了人民币可控性升值以及逐渐向金融自由化过渡的道路。英美金融模式尽管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但仍被视为唯一的选择。而中国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向着这一模式靠拢。

但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路径。它终结了中国向美国模式靠拢的计划,反而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进程。这次危机为人民币的推广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紧迫性,同时也改变了人民币的发展路径。通过暴露美国模式深层次的缺陷,这场危机在中国引发了一种新的情绪,我称之为“买方的懊悔”(buyer's remorse)。中美经济已经死死地捆绑在一起,这使得中国成为了美元的利益攸关方。这次危机还加深了中国精英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过于暴露在全球金融经济风险之下,因此要求加强中国经济的隔离性。

对美国模式的不信任,希望进一步拉开与美国经济的距离以及中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加速上升,这些因素使得人民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货币的愿景加速呈现出来。此外,中国的许多经济伙伴也希望能在美元、美国金融模式和美国经济之外找到更多的替代性选择。问题就在于,应当如何将这些愿景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考虑到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以及中国国内金融业充满不确定性。中国近来采取了一系列清晰可见的举措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角色,最为显著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部分在快速增加,尽管总体比例还不是很高。与此同时,人民币也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储备货币的选择(仍受到一系列限制)。香港的银行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而新加坡也在争当人民币业务的离岸中心。总而言之,这些举动与本书中所阐述的国家行为的预期是一致的,它们预示着一个新的区域架构正在逐

渐成形,而在这个架构中,人民币正在崛起为亚洲的关键货币。

许多观察者认为人民币能否成为重要的区域性货币有赖于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进一步来说,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当今英美经验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流动性强的金融产业。而本书中的案例则显示出,中国无需采用这样全面的金融开放或者向一个“正确”模式靠拢,就可以极大地提升其货币的影响力。《货币与强制》一书揭示出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货币安排都可以在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运行,而在某些案例中,那些货币安排确实具有非自由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不是(或者不应该认为)市场友好型的,相反,这只不过体现出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道理。

如果说培育他国对中国的货币依赖显示出了中国对货币权力的渴望,那么货币权力的第三种工具——体系破坏则暗示出潜在的危险。有人观察到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元储备,就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可能会以这些庞大的美元储备作为政治强制的威胁手段。然而正如《货币与强制》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这种“颠覆性破坏”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和其他可能考虑这种颠覆性破坏的国家一样,担心这样会造成巨大损失。中国现在的处境就是“买方的懊悔”——后悔自己持有过多的美元储备。不过,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决定美元未来和美国经济健康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在一场摧毁美国货币或者经济的对抗中,中国也可能成为一个大输家。美元的大幅贬值会重创中国经济——美元贬值会使得美国进口需求大幅下滑,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尽管中国完全可以抛售美元储备,但这同时也会带来自身经济的毁灭。对美元实施“战争边缘”政策(dollar brinkmanship)可能会极具诱惑力,但这可能很显然并非中国的兴趣所在,因此也就只能算是一种虚张声势。

但是,中国手中确实掌握了更加巧妙的货币权力杠杆——我在书中称之为“策略性破坏”。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有能力影响美元资产利率的变化,同时在调整其储备资产组合时,中国也有能力选择具体时间点以及公开与否,从而令美国颇感忌惮。如果国际政治局势恶化,中国可能会采用这种巧妙的货币权力手段在政治冲突时引起美国的注意。不难想见,中国决策者会更容易得出结论,“颠覆性破坏”只能用于虚张声势,而“策略性破坏”更有利于实现政治目标。这也是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潜在原因



之一。托马斯·谢林称之为“摇船”(boat-rocking)的风险操控战略,其实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举动。

本书所讨论的对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案例或许就是法国在战争时期推行策略性破坏的尝试。尽管具体的环境有所不同,但中国和美元的关系与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的英法货币关系十分相似。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使得法国可以从英国任意地提取黄金。正如书中所提到的一样,当英法两国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有所分歧时,法国就会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权力要挟英国。但法国的经验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在决定利用其货币权力之后,法国将金融体系当做影响德国(甚至整个西欧)的杠杆。对于英国,法国则采用了“摇船”战略,以暴露其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本质。每当英法意见不合,黄金就会从英国流向法国。然而这些举动几乎从未成功。事实上,法国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其货币权力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场灾难是指1931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始于奥地利最大的银行——联合信贷银行的破产。尽管奥地利政府试图控制这场危机,但人们还是不断地涌向银行进行挤兑活动。随后危机蔓延到德国,其金融业也惨遭损失。在危机席卷英国之前,外汇储备的快速蒸发迫使当时的世界关键货币——英镑脱离了黄金本位。近到美国远及日本都受到了英镑与黄金脱钩的影响,而这也成为日本走向政治激进的决定因素之一。[我在《安抚银行家:通向战争之路上的金融警告》(*Appeasing Bank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一书中讨论1931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时,专门提到了日本]。

1931年的那场危机对于学习当代政治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与近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十分相似。只不过1931年的那场危机如脱缰野马般失去了控制,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为什么会这样?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政治。危机爆发伊始,英国就积极设法阻止危机向欧洲各国银行蔓延,并且支持奥地利和德国迎战危机。相反,法国看到的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它采取了劫掠型货币操控(对奥地利的货币施压),并且试图在援助奥地利和德国时附加政治要价,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崩溃却最终使法国货币权力的化作一团泡影。

1931年和2007年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

一次危机中,欧洲大陆上剑拔弩张的安全困境阻碍了各国间的合作以共同对抗危机;相比之下,2007年相对和缓的安全环境为控制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们无法保证下一次的国际政治环境依然会如此宽松,就像法国在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那样。这是因为即便一国有意愿极力避免破坏世界经济,但由于置身于冲突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良好的意愿并不总能阻止代价高昂的错误。

在本书第一版中,我曾感谢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给我带来的知识上的启发,尽管那时我们还未曾谋面。我有幸在几年之后和他相见,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他认为《货币与强制》过多地强调了政治上的斗争,而对政治合作着墨不多。在中国不断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背景下,我希望他很乐意见到本书所总结的经验与他的观点更加契合。对中国来说,接下来的几年充满了机遇。通过运用其手中的资源,中国可以实施保护型货币操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并非一定是为了获取强制性的权力。但毫无疑问,随着中国渴望更多的自主性和隔离性,中美关系中难免有政治敌对和竞争的成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激烈冲突。唯一的危险在于,一旦中美关系恶化,国际金融领域就会狼烟四起,成为一片兵戈之地,这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而这种可能性一直阴魂不散,始终未能排除。

乔纳森·科什纳

2013年2月于纽约伊萨卡

## 致 谢

我斗胆宣称本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它显然又从已有的知识和既有的传统中受益良多。我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深表感激。这些前辈既有经济学者，尤其是那些对探究政治因素深怀兴趣的经济学者，也有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恕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感谢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作为我的学术偶像，他是最需要感谢的人。

本书的绝大部分研究内容都是我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完成的。在这两年间，我先后得到了福特基金会设立的关于欧洲社会和西方安全方面的博士论文奖学金和约翰·奥林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博士论文奖学金的资助。此后，我在南加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本书做了进一步完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住友银行博士论文奖学金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另外一部分资助。我要感谢上述机构的理查德·艾肯伯格(Richard Eichenberg)、山姆·亨廷顿(Sam Huntington)、斯蒂夫·罗森(Steve Rosen)、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和哈里·比恩(Henry Bienen)对于这项研究工作的支持。

本项研究从很多学者的批评与评论中受益。他们包括柯庆生(Tom Christensen)、阿兰·德里默(Alan Drimmer)、乔治·唐斯(George Downs)、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约翰·加罗法诺(John Garofano)、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珍妮·高娃(Joanne Gowa)、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贝斯·基尔(Beth Kier)、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乔·奈(Joe Nye)、肯·奥耶

■ 货币与强制

(Ken Oye)、马克·斯波丁(Mark Spaulding)、夏布利·塔哈米(Shibley Telhami)。此外,我也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马尔科姆·德贝沃伊斯(Malcolm DeBevoise)、艾琳·普拉特(Eileen Pratt)、卡雷尔·塞德拉切克(Karel Sedlacek)和米尔德里德·卡尔马斯(Mildred Kalmus)。

最特别的致谢要送给我的导师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感谢他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卡尔·米勒(Karl Mueller)和贝斯·西蒙斯(Beth Simmons)给本书提出了十分详尽的修改意见,这对于本书的修改几乎是无价之宝。最后,我要着重感谢埃斯蒂(Esty),她直接经手了本书的每一个字。

# 目 录

中文版序 货币、强制与当代中国 / I

致谢 / IX

---

## 第一部分

### 货币权力理论

第一章 货币权力的性质 / 3

第二章 货币权力的可行性 / 23

---

## 第二部分

### 货币权力的实践

第三章 货币操控 / 51

第四章 货币依赖 / 127

第五章 体系破坏 / 186

---

## 第三部分

### 货币权力的潜力

第六章 货币权力的机会之窗 / 239

第七章 货币权力与国际关系 / 285

译后记 / 305

## 第一部分

---

# 货币权力理论



# 第一章

## 货币权力的性质

金钱不会言语，金钱包含诅咒。\*

——鲍勃·迪伦

### 导 论

国家和它们的领导人对其货币的神圣不可侵犯往往异常敏感。在1350年的英格兰，伪造国王的金币或者银币是一种严重的叛国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在7世纪的中国，不仅货币的伪造者本人将被判处死刑，甚至连同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也很难幸免。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时任世界最大和最富有经济体的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收支平衡问题“持续困扰”。他曾如此说道：“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货币的力量”，而对所谓核武器的重要性满不在乎。“不列颠拥有核武器，但英镑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每个人都能玩弄它于股掌之中。”<sup>1</sup>

本书事关货币问题的国际政治后果。它考察国家怎样才能将国际货币关系当做一种施加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的工具来运用。“国际货币关系”是指一系列特定的安排和行为，而这些安排和行为能影响国家发行的国民货币(national currency)的价值、使用、稳定以及其他属性。

---

\* 美国著名民谣歌手的一句歌词。——译者注



“强制性权力”是指国家通过操控这些关系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偏好或行为。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能够利用英镑的弱势来逼迫英国从埃及撤军。<sup>2</sup>

国际货币外交有时也被称为“货币外交”(monetary diplomacy)或“货币权力”(monetary power)，它是一个研究的盲点。研究国际货币关系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货币使用的效率、货币之间的合作和货币收益的分配等问题上。而那些探讨经济权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研究者们则强调贸易、援助和融资关系。本书则致力于探究上述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面。

本书将货币权力从经济权力中单列出来，以进行专门讨论。但这并非是在否认(或者忽视)货币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外交之间的关系。此外，本项研究集中探讨与安全相关的或者涉及其他非经济目标的货币权力的运用。这意味着，本书将不考虑国家运用货币权力来增加自身绝对或相对财富的那些努力。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互有重叠，从长期来看，我们显然很难将对财富的追逐和对权力的追逐彻底区别开来。<sup>3</sup>但是，本书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非经济目标，这并不是想要在两者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即便这种界限确实存在。我只是想特别强调光谱的一端而已，而在这一端，非经济目标是最主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的首要关注点是非常清晰的。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同样的经济制裁手段既可以被用来实现安全目标，也可以被用来实现经济目标。如果是前者，一项出口禁令可能旨在破坏或颠覆一个政府，而如果是后者，出口禁令可能是被用来撬开对方的市场。

本书之所以要将分析限制在那些运用货币权力来达到非经济目标的案例上，是为了让货币权力的主题更加集中和明确。由于分析集中在安全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把经济利益这个与安全关切不同的变量，从一些相互交织的影响变量中排除，而经济利益这个变量在国际经济博弈的背景下显得十分复杂。而且，对安全问题的强调，也与作者持有的一个观点一脉相承，即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把权力和安全议题纳入进来。

本书的具体目的就是论证货币权力的存在，并且试图理解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包含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阐释货币权力的基础理论，即货币权力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才能有效并且为什么能够有效。在